# 史記會注考證

壹

〔漢〕司馬遷 撰
（日）瀧川資言 考證
楊海崢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 史記會注考證

壹

〔漢〕司馬遷　撰
（日）瀧川資言　考證
楊海峰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史記會注考證／(漢)司馬遷撰；(日)瀧川資言考證.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325-7927-3

Ⅰ.①史… Ⅱ.①司… ②瀧… Ⅲ.①中國歷史—古代史—紀傳體②《史記》—研究 Ⅳ.①K2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317032 號

**史記會注考證**

(全八册)

[漢]司馬遷 撰

(日)瀧川資言 考證

楊海崢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www.guji.com.cn

(2)E-mail：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www.ewen.co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41.75 插頁 40 字數 3,530,000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1—1,000

ISBN 978-7-5325-7927-3

K·2141 定價：88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繫

本書爲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

責任編輯：占旭東
美術編輯：嚴克勤
技術編輯：富　强

# 序

安平秋

史記會注考證是日本學者瀧川資言(又稱瀧川龜太郎)對中國漢代司馬遷撰著的史記所作的集注與考訂。從它問世至今的八十餘年間,一直受到中日兩國學者的器重。

瀧川資言在這部著作中,廣泛搜集日本所藏的史記鈔本、刻本和中日兩國學者的校勘成果,對史記正文作全面細緻的校正,力圖使史記正文符合司馬遷文筆的原樣。他匯總中國晉唐時期的「三家注」和其後的衆多史記注家的注釋,分列於史記正文的相關字句之下,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其中對「史記正義佚文」的收集,至今仍是中日學術界關注和討論的重要問題。他以「考證」的名目發表自己對史記的理解,內中所徵引的中日兩國學者的研究成果達一百二十餘家之多。他在匯總這些成果之後所發表的意見,常有見地。可以說,在今天,它仍然是收集資料最爲豐富的史記集注本,對今後中日兩國的史記研究依然起著重要的作用。瀧川資言的這部史記會注考證和另一位日本學者池田蘆洲的史記補注是日本史記學史上的兩座高峰。

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在日本共出版了兩次。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由日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陸續在四年間全部出齊,共十册,人們習慣稱之爲「初版本」。第二次是在瀧川資

言去世後第十年的一九五六年開始至一九六〇年，由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校補刊行會在五年內陸續出齊，也是十册，人們習慣稱之爲「改正本」。「改正本」糾正了「初版本」中或因稿本、或因排版而出現的錯誤。由於該書的影響逐漸增大，自一九五五年至二〇〇九年的五十五年間，中國的各家出版社紛紛影印出版史記會注考證。初步統計，影印出版該書的中國大陸出版社有四家，台灣出版社有十家。但是，兩岸的出版社都是影印該書的「初版本」，而没有用糾正了錯誤的「改正本」。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岸對日本學術信息、出版信息了解的滯後。

這次由楊海崢老師整理的史記會注考證所用的底本，是日本出版的「改正本」，這是其勝過兩岸已影印出版的各種史記會注考證之處。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這次整理工作對全書加以新式標點，重新排版。在標點整理的過程中，楊海崢老師又發現「改正本」的一些錯字和疏誤，都以審慎的態度予以注明改正。這樣呈現給讀者的八厚册史記會注考證標點整理本，是底本有據、資料豐富、更便於閱讀使用的版本，是史記會注考證出版史上乃至整理史上的一個新樣本。相信此書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後，會對中日兩國史記研究起到推進作用。

這次整理工作的主持人是北京大學中文系的楊海崢副教授。她多年致力於古文獻學、古代文學的教學、科研工作，於史記、漢書用力更勤，其研究論著如漢唐史記研究論稿（齊魯書社二〇〇三年）、日本漢學家池田蘆洲和他的史記學成就（文史二〇一四年第四輯）等都體現出她的真才實學。二〇〇六年和二〇一三年，她曾兩次以史記研究爲課題獲得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由於她的英語水平好，得以更多地

關注國外學者在這一學術領域的研究成果。近年她把注意力放在日本史記學的研究領域，在完成史記會注考證的點校、整理之後，轉而關注日本江户時代的史記學研究。楊海峥的治學長處是古文獻功底堅實，注重對課題在廣域上的宏觀把握，又能在具體工作中下苦功夫深入進去。如這次的點校、整理史記會注考證，從選擇底本、複印底本、逐字逐句整理標點、反復審看全稿和校樣，到前言和凡例的寫作，她都是一絲不苟，力求做到最好。

還有一件事需要提及。這次楊海峥老師點校整理這部書，本來是按照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要求，把水澤利忠先生所作的史記會注考證校補一書打散附在史記會注考證各篇之後一起點校整理的。這是因爲上海古籍出版社在一九八五年影印出版史記會注考證附校補時已經這樣做了，並且受到了學術界的歡迎。楊海峥老師已於二〇一二年底全部完成標點整理並交稿。但二〇一三年底水澤利忠先生去世後，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先生代表水澤利忠先生家屬提出不同意將水澤先生著作與史記會注考證合在一起出版，而準備由小澤賢二先生另行整理出版。鑒於這一狀況，楊海峥老師在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溝通後，表示同意撤下水澤利忠先生的校補，這次只出版史記會注考證。這就使得她幾年辛苦完成的數十萬字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的標點整理成果不能出版，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但從中也可以看出楊海峥老師對人的尊重和處事的厚道。

二〇一五年三月十日於北京大學

# 前言

## 一

瀧川資言(一八六五至一九四六),號君山,通稱龜太郎。日本慶應元年(一八六五)十一月十二日出生於日本島根縣松江市,是日本著名武士瀧川一益的後代。其父瀧川泰之丞爲小學教員,修漢學。明治以後,瀧川泰之丞在家鄉開辦了瀧川塾教授漢學。瀧川塾的教材後來常被其他漢學塾選作教授漢學的教科書。瀧川泰之丞嚴格要求並督促其子孫努力學習漢學。父親嚴厲的家教對瀧川資言的人格以及治學風格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瀧川資言幼年在家鄉先是師從雨森精翁、内村鱸香學習漢文,後進入松江師範學校附屬上等小學學習,明治十年(一八七七)三月三十一日拿到小學第八級卒業證書,於明治十二年(一八七九)進入松江中學學習。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三月九日,瀧川資言離開家鄉去東京,進入日本著名漢學家島田篁村開設的篁村精舍繼續學習漢學。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全國上下普遍實行文明開化、追慕西學的文化政策,研究中國古典學問的傳統漢學受到空前的衝擊。明治五年(一八七二),日本政府頒佈了近代新學制,各種洋學塾、專門學校隨之紛紛興起,傳統的漢學私塾相繼被迫關閉。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明治十年(一八七七),東京大學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式成立。其文學部所設第一科爲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論和方法建置的史學、哲學、政治學科，所講内容也只限於西方。第二科爲研究日本、中國傳統學術的和漢文學科。在當時的日本，一般的青年學生爲了畢業後能够找到工作，紛紛把目光投向西洋學術。據東大校史統計，和漢文學科從明治十年開設到明治十九年十年間，專業畢業生竟只有兩人。可見傳統漢學教育在當時日本高等教育體系中實際上已岌岌可危。後在加藤弘之的再三申請下，文部省批準在東京大學增設附屬于文學部的「古典講習科」，分爲甲部、乙部，甲部教授日本國學，乙部以漢學爲主要教學内容，又稱「支那古典講習科」，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正式招生。瀧川資言就是東京大學「支那古典講習科」的第一届學生，經過四年的學習，於明治二十年（一八八七）畢業。同期學習的有市村瓚太郎、和田英松、島田鈞一、林泰輔、山田準等人。這批學者以復興傳統漢學爲己任，致力於漢學的研究與普及，對近代日本漢學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瀧川資言從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畢業後，因爲不通洋學而十年找不到固定工作，先後在法制局、内閣官房署等處任職，擔任文書等工作。在這十年間，瀧川資言也一直没有停止對漢學的研究。瀧川資言擅長漢詩文寫作，其所作漢詩文，常被作爲漢文寫作的範文刊載於日本東洋文化等漢學雜誌上。明治四十二年（一九〇九）前後，瀧川資言完成了一批標點注釋中國典籍的著作，如高等漢文、御注孝經、孟子集注、論語集注、大學中庸章句、古文真寶前集、古文真寶後集、左氏傳鈔、審定十八史略鈔、唐宋八家文読本鈔等。爲普及和推廣漢學做出了很大貢獻。其中一些著作多次重版發行，可見其影響之大。

瀧川資言早年對中國歷史十分關注，明治二十一年（一八八八），他在由杉浦重剛、井上哲次郎等創刊東洋學藝雜誌上發表長文支那古代哲學史一斑。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二月，日本東京吉川書店

刊行了瀧川資言與市村瓚次郎歷時五年共同完成的支那史六卷。一九〇三年，中國清政府推行新式教育，大中小學校均設立「歷史」一科，急需歷史教科書，以「文明史」、「開化史」命名的大量日文書籍被翻譯或編譯成中文，充當西洋史和中國史的教科書之用，對當時中國人自己編纂的歷史教科書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瀧川資言和市村瓚次郎所著的支那史由支那翻譯會社編譯爲支那四千年開化史在中國出版，頗受歡迎，後多次重版，曾被作爲中學歷史教科書使用。大正四年（一九一五），瀧川資言與鹽谷温一行到中國旅行時，偶然在上海的書店裏發現了此中譯本，瀧川資言當即買下，後在卷末留下了一段紀念性的文字。

明治三十年（一八九七），瀧川資言結束了十年飄泊不定的生活，前往仙台第二高等學校（現日本東北大學）就職。其後的三十年，他一直在仙台第二高等學校教書，這三十年也是他傾心撰著史記會注考證的時期。

瀧川資言於昭和五年（一九三〇）退休回松江，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又回到東京，先後擔任大東文化學院和東京文理科大學的教授。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避戰亂離開東京回到松江。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二月二十三日，瀧川資言在松江家中去世。

由於史記會注考證所產生的重大影響，瀧川資言去世後，其故鄉松江多次舉行紀念活動。在昭和五十年（一九七五）瀧川資言去世三十周年的紀念活動上，松江市政府對瀧川資言的漢學成就高度讚揚並爲其建碑紀念，還做了關於松江市瀧川塾的調查。當時很多著名的漢學家都參加了紀念活動，京都大學著名教授吉川幸次郎用漢文作瀧川君山先生故宅碑銘，盛讚瀧川資言著述史記會注考證的影響和

成就：

「有一代之書，有百代之書；有一邦之書，有萬邦之書。司馬子長繼春秋作史記，撥亂反正，述往事思來者。來者習之，不獨禹封，朝鮮之東，首推我邦；大宛而西，歐美近或習之。而凡習之者，莫不津逮於瀧川君山先生史記會注考證焉。蓋子長之書，發憤而作，辭或隱約，晉唐之間爲之注者僅存三家，降及近代，德川與清學者以考據名家，亦鮮及之。先生乃以二十年功，歷驗衆説，網羅舊本，如百川之吸於海，群峰之小於岱，千年疑滯發揮殆盡。宜乎東京始刻之後，海外遞有傳印之本，衣被之廣，我邦儒者之業罕見其匹。非先生之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雄于文，孰能如此哉？」（吉川幸次郎全集第二十三卷補篇第五百七十七頁，日本筑摩書房一九七六年版）

## 二

誠如吉川幸次郎所言，史記會注考證（以下簡稱考證）乃瀧川資言傾注後半生心血完成的著述。考證卷末有瀧川資言所作書史記會注考證後，其中提到：「大正二年，予得史記正義遺佚於東北大學，始有纂述之志。」可見其著述考證始於大正二年（一九一三），且與史記正義佚文的發現密切相關。從大正二年「始有纂述之志」，到昭和五年至六年間（一九三〇—一九三一）考證撰成，瀧川資言用了將近二十年的時間。

據瀧川資言在大正十一年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間爲獲得研究資助向仙台齋藤報恩會所提交的報告書所言，其所著考證主要包括以下內容：（一）史記版本校勘；（二）究明司馬遷所據資料；（三）史記三家注的訂補；（四）歷代注釋集成。這是瀧川本人對考證內容和特點的準確概括。

校訂史記版本是瀧川資言撰著考證的重要目的。瀧川資言在參考中國南宋黄善夫刊三家注本、元彭寅翁刻本、明柯維熊刻本、明秦藩刻本、明南監刻本、明淩稚隆史記評林本、清代張文虎所校金陵書局本的基礎上，充分利用日本所藏各種寫本和刻本，對史記進行了全面校勘。

瀧川資言廣泛搜集日本所藏史記鈔本殘卷校勘史記文本，他在史記總論史記鈔本刊本中提到：「蓋刊史記，自北宋始也。而隋、唐之舊不可復見。我邦幸有古鈔本數種，概皆卷子。仍存往時面目，文字間與今本異，可以資於校勘。」考證中所列史記鈔本殘卷有宮内廳書陵部藏清原家點本五帝本紀第一、求古樓高山寺舊藏東洋文庫藏天養鈔本夏本紀第二、高山寺藏羅振玉影印殷本紀第三、高山寺藏周本紀第四、高山寺舊藏東洋文庫藏天養鈔本秦本紀第五、神田文庫藏羅振玉影印河渠書第七、宮内廳書陵部藏高祖本紀第八、毛利家藏延久鈔本吕后本紀第九、東北大學圖書館藏延久鈔本孝文本紀第十、野村氏久原文庫舊藏大東急記念文庫藏延久鈔本孝景本紀第十一、山岸德平氏藏大治鈔本孝景本紀第十一、宮内廳書陵部藏范曄蔡澤列傳第十九、高山寺藏羅振玉影印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高山寺藏羅振玉影印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等十四種。

此外，瀧川還參考了日本所藏史記古刻本及前代日本學者的史記校勘成果。這些古刻本包括日本慶長古活字本、南化和尚舊藏南宋慶元黄善夫本(南化本)、楓山文庫舊藏元彭寅翁本(楓山本)、三條西實隆手寫彭寅翁本(三條本)等。這些古版本本身及其邊欄外所留存的前代日本學者的校記都是非常珍貴的校勘資料。

現存日本學者用漢文注釋史記的最早的本子是日本南北朝時期藤原英房所作的英房史記抄，水澤

利忠先生考證推斷其鈔寫時期是正平三年。其後又有僧桃源瑞仙的桃源史記抄和僧幻雲的幻雲史記抄。這些珍貴的寫注本也被瀧川資言用作校勘史記的資料。江戶時期日本學者大島忠藏（號贊川）以日本所藏史記古本校勘史記，撰成博士家本史記異字（又名天朝傳本史記說）三卷，此後，其子大島桃年（號藍涯）繼承父業，校勘日本幕府及各諸侯所藏二十餘種史記版本中文字的異同，編成史記考異十四册。這兩種書在史記校勘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瀧川資言在考證中多處引用了其校勘成果。

考證徵引的史記版本資料衆多，十分珍貴，但考證卷帙龐大，難免有失。考證出版後，水澤利忠又以考證爲底本，用其所見的日本史記古鈔本、刻本以及前代日本學者的史記校記對史記正文及三家注重新進行了比對和校勘，撰成史記會注考證校補，爲史記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資料，可與考證配合使用。

至於瀧川資言著述考證時所採用的底本，據瀧川史記總論史記鈔本刊本自述「愚著史記會注考證，以金陵本爲底本，正文以我邦所存鈔本校，正義以僧幻雲所録補」。

日本學者小澤賢二在水澤利忠處見過瀧川資言考證的稿本，據他描述，瀧川資言是將史記正義的佚文用紅筆鈔録在鳳文館本史記評林的欄外及行間，這是其作史記會注考證的開始。之後，瀧川資言將鈔録史記正義的史記評林裁下來，粘貼在大開本的史記評林上，在各頁空白處，再用朱筆鈔録各家注文，並與桃源史記抄、幻雲史記抄及博士家本史記異字等相核對。故從其稿本來看，瀧川資言是以日本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鳳文館本史記評林爲底本，在考證初稿完成後與金陵書局本進行了對校。

在史記三家注中，司馬貞史記索隱與張守節史記正義有很多重複之處，而在宋代史記索隱的影響遠

大于史記正義，所以宋代在合刻史記三家注時，對史記正義進行了删節，且删節數量很大。隨著三家注合刻本的流行，單本史記正義逐漸湮没以致失傳，明代起已很難見到史記正義的全貌，輯録史記正義佚文者亦隨之出現。

瀧川資言在史記總論史記正義佚存中，對其力圖復原史記正義的過程有詳細的敘述：「吾讀三家書，益知三注本所録正義多削落甚多也。偶繙東北大學所藏慶長寬永活字本史記，上欄標記正義一千二三百條，皆三注本所無。但缺十表。其後又得桃源史記抄、幻雲抄、博士家史記異字，所載正義略與此合。……吾邦有索隱本，有正義本，索隱與此注所載大同，正義者此注所不載者夥。故諸本之上書之。余於是知大學本標記之所由，欣喜不能措手，録以爲二卷，題曰史記正義佚存。……今録之會注正義各條，略復張氏之舊云。」

瀧川資言考證所收録的史記正義佚文來自日本東北大學圖書館狩野亨吉文庫所藏日本慶長寬永年間刊「八行有界」古活字本史記欄外所記。瀧川將這些正義佚文逐條鈔録下來，輯成史記正義佚存二卷。在其去世後，瀧川資言自筆本的史記正義佚存散落到古書肆中，由長澤規矩也買下，贈與了水澤利忠。

對史記正義佚文的輯佚是瀧川資言的一大貢獻，同時也是其爲人詬病所在。考證問世之後，瀧川資言所輯史記正義佚文的來源和真僞也受到了廣泛質疑，成爲學者批評的焦點。中國學者賀次君、程金造等分别舉例進行辯駁，全面否定了考證所輯正義的可信性。雖然考證所輯「佚文」是否全部是正義原文尚有争議，但這些材料對於探求史記正義原貌以及正確理解史記文義都是非常重要的。

廣泛徵引中國和日本歷代學者的史記研究成果亦是考證的一大特色。考證彙集衆家之說，將其附於史記相關文字下，並加以考辨和説明，這些詳實的資料爲研究者提供了極大方便。

據瀧川資言史記考證引用書目舉要統計，考證中引用的中國著作一百多種，日本著作二十多種。涉及的日本學者有恩田仲任、村尾元融、岡白駒、皆川愿、中井積德、近藤守重、龜井昱、豬飼彦博、古賀煜、安藤維寅、多紀元堅、多紀元簡、僧瑞仙、僧壽桂、佚名、岡本保孝、安井朝衡、竹添光鴻、新城新藏，計十九家。中國學者則包括了唐劉知幾，宋王應麟、洪邁、鄭樵，金王若虛，元馬端臨，明柯維騏、陳仁錫、徐孚遠、顧炎武，清方苞、王鳴盛、趙翼、錢大昕、梁玉繩、王念孫、沈家本、錢泰吉、張文虎，近代李笠、梁啓超等，計八十四家。這一百多家中日學者的研究成果是極其珍貴的史記研究資料，特別是其中所引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在中國國内很難看到。

瀧川資言在博採衆家之説的基礎上，還對很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對前代學者的説法進行了分析和考證。其「考證」内容包括辨析文字的歧異正誤；闡釋疑難文句的意義；指出記載的矛盾、失誤；訂補史記三家注等，對前人未加解説或解之未詳之處往往加以考辯。考證重視探究史記所使用的文獻材料的來源，儘量注明其史料的出處，常于正文之下，指出此事亦見於某書。史記與他書文字不同之處，也予以注明，方便學者溯本求源，對比研究。考證重視對地理的解釋，對史記中出現的地名都儘量注出其具體位置、沿革和今地名。考證深受史記評林影響，注重對史記文章風格、寫法的分析以及對史記中所載歷史人物的點評。

總體而言，考證中瀧川資言所作之「考證」部分，態度審慎，在證據不充分的情況下，不輕易下斷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